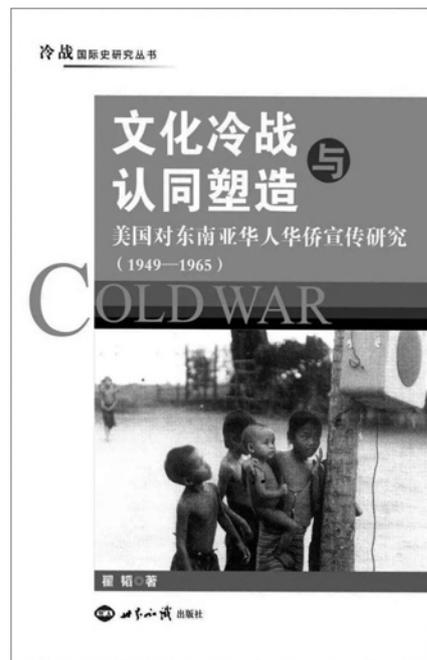


冷戰史研究的「文化轉向」

——評翟韜《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傳研究（1949-1965）》

● 曲 升

《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傳研究（1949-1965）》是翟韜在戰後美國對華宣傳領域深耕多年結出的碩果，對於推進中國的美國外交史研究、中美關係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



翟韜：《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傳研究（1949-196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翟韜是近年來在中國的美國史學界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專攻戰後美

國對華宣傳和文化外交問題。他在北京大學完成研究生學業，博士導師是國內美國外交史研究領域頂尖學者王立新；而之後作為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C Irvine) 訪問學者，其外方導師則是美國外交史學「文化轉向」的開拓者之一羅森堡 (Emily S. Rosenberg)。顯然，翟韜不僅經過良好的專業學術訓練，而且受到美國外交史學新風尚、新路徑和新方法的薰染，能夠自覺追蹤美國史學前沿，並基於自身學術關懷，主動開闢新的研究領域。其著作《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傳研究（1949-1965）》（以下簡稱《宣傳研究》，引用只註頁碼）作為「冷戰國際史研究叢書」之一種，是他在戰後美國對華宣傳領域深耕多年結出的碩果，對於推進中國的美國外交史研究、中美關係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

由於論題較為集中，所涉時段不長，《宣傳研究》一書的主體結構並不複雜——除「導論」介紹相關

學術史和研究方法外，共設四章，分別探討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傳政策演變，宣傳機構、媒介和目標人群沿革，宣傳內容和主題變化，宣傳效果評估。本書的內容十分豐富，敘事堪為生動，方法新穎有效，從而成就了一部「骨骼清奇、血肉豐滿」的佳作。在2022年進行的「第二屆楊生茂美國史最佳青年論著獎」評選活動中，《宣傳研究》一書脫穎而出，榮獲最佳著作獎。王立新撰寫的頒獎詞充分肯定了本書的學術地位和學術價值，稱之為「迄今為止學術界關於冷戰時期美國對華人華僑宣傳問題的最全面研究，具有填補以往研究空白的意義」^①。這裏，筆者基於自身關於美國外交史學發展的理解以及對《宣傳研究》的深度閱讀，從學術趨勢、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較為詳細地談談本人對於本書的理解及其特色、貢獻與不足。

一 研究趨勢和概念術語

1947年3月12日，第三十三任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在國會特別會議上發表演說，稱「在當前世界歷史關頭」，幾乎每個國家都必須在自由和集權主義兩種生活方式中做出選擇，而美國的政策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制武裝起來的少數人和外來的壓力企圖強加給他們的奴役」，「支持自由的人民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來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②。這篇演說所表達的外交政策，史稱「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被視為美國「對蘇聯發動

全面『冷戰』的宣戰書」^③。1990年11月21日，第四十一任美國總統布什(George H. W. Bush)在巴黎正式宣布冷戰結束。這位「打贏了冷戰」的美國總統秉承杜魯門對於冷戰乃「兩種生活方式鬥爭」的界定，並精闢地指出「冷戰所爭奪的正是人心的向背」^④。可見冷戰本質上是人心之爭和生活方式之爭，這種理解貫穿戰後美國總統冷戰思維之始終；而這種思維定式決定了宣傳戰、心理戰和文化外交等非軍事、經濟遏制在與蘇聯冷戰對抗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

不過，美國冷戰史學界關於宣傳戰的研究並未隨着冷戰發端而同步展開，而是要等到冷戰結束後，隨着檔案資料的大規模開放以及研究取向上文化轉向興起，方漸成潮流，在較短時間內湧現出一批學者和成果。對此，美國華裔學者翟強最早予以梳理，並在2014年撰文向中國學界介紹^⑤。作為該研究領域的新銳學者，翟強有着極強的學術敏感性和前沿意識，其對於相關研究領域動態的關注，似乎並不晚於翟強^⑥。而且他能夠持續追蹤，及時總結，並在廓清前沿動態的基礎上，因應主流趨勢，從而把自己的相關研究置於學術前沿地帶。

在2018年發表的綜述文章中，翟強從學術史「內史」學理演進的角度，分析了美國冷戰宣傳史的興起和嬗變，重點梳理了該領域內的兩個發展趨勢：一是用文化方法、文化理論和文化視角來解釋對外宣傳問題，尤其是美國的形象宣傳與國家身份之間的關係；二是考察冷戰宣傳機構制度史背後的組織文化和

翟強曾分析美國冷戰宣傳史的興起和嬗變，指出對宣傳的主題做文化闡釋，應該作為該領域未來發展方向之一；又在文化轉向之外，指出美國冷戰宣傳史研究的兩個趨勢，即研究空間範圍的擴展和時間範圍的延伸。

本書把握了美國冷戰宣傳史研究的兩大發展趨勢——文化轉向和第三世界轉向。前者涉及研究路徑和方法創新問題，後者涉及研究對象選擇問題。作者嘗試達成外交史和文化史的交叉結合，以突破限制宣傳史研究思路的外交史的「緊身衣」。

政治文化。他指出，對宣傳的主題做文化闡釋，應該作為該領域未來發展方向之一^⑦。在同年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中，翟韜則在文化轉向之外，指出二十一世紀以來美國冷戰宣傳史研究的另外兩個趨勢，即研究空間範圍的擴展和時間範圍的延伸，並把這些發展趨勢概括為「超越冷戰史」，認為研究的空間範圍有所擴展，即由局限於美國對蘇聯、東歐的心理戰，擴展到美國對第三世界、盟國的宣傳和心理戰，具有廣闊的學術前景^⑧。

上述精細的學術史梳理雖然未被《宣傳研究》納入「導論」，卻構成本書的學術史背景，襯托出其學術前沿地位。顯然，本書準確把握並因應了美國冷戰宣傳史研究的兩大發展趨勢——文化轉向和第三世界轉向。前者涉及研究路徑和方法創新問題，後者涉及研究對象選擇問題，體現了作者鮮明的現實關懷和敏銳的學術眼光。翟韜指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擔心華人華僑成為東南亞當地社會和新獨立國家中共產黨力量的急先鋒和「第五縱隊」，所以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群體開展了持續近二十年、以中文為主要宣傳語言的聲勢浩大的宣傳運動，以爭奪當地華人輿論和贏得華人人心；對於這段歷史的研究，不僅在美國對外宣傳史、華人華僑史、中美關係史三個領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理解中美關係的現狀也頗具現實意義（頁2）。在他看來，上述三個領域分別對應的大領域是文化史、族裔史和移民史、外交史和國際關係史，而他將重點放在嘗試達

成外交史和文化史的交叉結合，以突破先前限制宣傳史研究思路的外交史的「緊身衣」，立足更為開闊的學術格局，展開對美國冷戰宣傳史的研究（頁18）。這種學術立意無疑十分新穎，也頗具挑戰性。

系統深入的學術史梳理不僅使作者獲得了開闊的學術格局，而且從微觀層面助力作者對相關概念做出精確界定和辨析。在借鑒、綜合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宣傳研究》對美國的冷戰宣傳做出了狹義、廣義的區分。狹義的「宣傳」，多採取諸如廣播、新聞發布、報紙刊物、電影等「快媒介」，主要針對大眾，側重於單向灌輸政治性的信息和意識形態，旨在塑造對美國自身有利的國外輿論和民眾心理狀態，也被稱為「信息外交」，經常和「心理戰」互換。廣義的「宣傳」，除包括上述狹義的宣傳，還包括文化交流和教育交流並舉的文化外交，多採取諸如教育交流、文化藝術交流和海外圖書（館）項目等「慢媒介」的方式，主要針對精英人物。關於「文化冷戰」的概念，本書取其廣義，泛指政府有意採取文化手段實現冷戰政治目的的所有活動，與「冷戰宣傳」概念有所重疊，但「文化冷戰」這一表述更為流行（頁9-10）。

二 全景式描摹與立體化剖析

為了探究1949至1965年間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冷戰宣傳這一長期未引起學術界重視的課題，翟韜在檔案發掘上可謂下足了功

夫。他對電子化檔案運用存在的弊端有着清醒認識，指出由於電子化檔案是從統一電子平台下載（而並非在檔案館通過所在機構檢索和調閱檔案），容易造成研究者對檔案所在的機構缺乏敏感，實際上不利於研究者了解各部門之間的關係、進而了解決策的多層次和豐富性，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缺少對各部門檔案的互證意識；此外，數據庫還存在內容「魚龍混雜」的問題，單憑文件下載，難以判斷檔案的來源及其在決策系統中的位置——而這點對於揭示決策過程而言是至為重要的（頁17）。

有鑒於此，除了學界普遍使用的「美國解密檔案在線」（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數據庫和《美國對外關係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之外，《宣傳研究》主要依靠的史料是美國國家檔案館第二檔案館未刊的外交檔案，既有聯邦政府最高決策層（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國務院）的決策檔案，也有「權力末梢」機構（美國駐外使領館，駐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東南亞的新聞處）的檔案，還有連接前兩者的「中層」部門（心理戰略委員會[PSB]、行動協調委員會[OCB]、國務院公共事務部門、美國新聞處[USIS，以下簡稱「美新處」]、中央情報局[CIA]等）的檔案。在掌握了相關政府機構核心檔案之後，翟韜把未刊檔案和出版檔案互補互證，外交檔案和宣傳報刊類史料結合使用，從而為全景式描摹與立體化剖析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事實上，「宣傳」（propaganda）是一門非常專門的學問，需要多方面的探討，不僅要分析信息本身和產生信息的歷史背景，還要分析傳播信息的媒介和接收信息的受眾。筆者以為，這種對宣傳進行立體化剖析的研究理路大體適用於歷史研究。《宣傳研究》的主題雖然是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冷戰宣傳，但作者始終從更廣闊的學術視野透視該問題，在研究美國與華僑關係的同時，拓展和涉及美中關係、美台關係、美國和東南亞國家關係，也涉及到美國在東亞、東南亞華人世界整體的宣傳戰略——在這樣的全景式歷史畫面中，美國華人華僑宣傳得以準確定位。繼而，作者從政策演變、機構媒介和目標人群、主題和形象、效果與特徵四個維度，對美國華人華僑宣傳展開了立體化剖析。

《宣傳研究》用第一章兩節的篇幅討論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政策的源起和演變，翟韜把演變的總趨勢概括為「從中國政策到東南亞政策」（頁21）。根據筆者的理解，這一政策進程實際上可劃分為四大階段：

1945至1949年為政策「熱身」階段，此時的宣傳雖以中國大陸和中國人民為目標，卻為日後在亞洲規模浩大且更為激烈的反對「紅色中國」宣傳運動和心理戰，組建了可資利用的組織機構（香港美新處、台北美新處），積累了「傳播美國夢」和「反蘇反共」宣傳的一定經驗。

1949至1956年為政策出台階段，宣傳主題完成了從「揚美」為重心到「反共」、「擁台」雙軌並行

《宣傳研究》的主題雖然是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冷戰宣傳，但作者始終從更廣闊的學術視野透視該問題，在研究美國與華僑關係的同時，拓展和涉及美中關係、美台關係、美國和東南亞國家關係，也涉及到美國在東亞、東南亞華人世界整體的宣傳戰略。

翟韜洞察到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在組織結構上具有「遙控指揮」、「頭重腳輕」的特點，即華人華僑宣傳不是由東南亞當地美新處主導，而是由港台美新處主導；這是由美國對華人華僑宣傳的基本定位所決定的。

的轉變，目標人群由中國人民轉向東南亞華人華僑，確定了以「華盛頓—香港—台北」為組織中心、以中文為主要宣傳語言的工作模式。

1956至1962年為政策反思調整階段，在重新評估海外華人對於美國的戰略價值，重新評估華僑政策與東南亞國家政治之間的關係、台灣當局—東南亞華人華僑的關係、台灣當局—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等的輕重緩急次序的基礎上，美國對宣傳政策目標進行了調整：「擁台」政策降級受限，「反(中)共」與「揚美」目標此消彼長，增加了「促進華人華僑融入當地社會」的目標。

1962至1965年為活動衰微階段，此間，美國的戰略視野徹底轉變，東南亞華人華僑問題不再是東亞冷戰中與對付中國大陸、扶植台灣當局密切相關的「中國問題」，而是東南亞國家的少數族裔問題，海外華人在美國東亞戰略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不再被作為單獨目標對待，相關宣傳活動隨之衰微，逐漸納入到對東南亞國家的整體政策進程當中。

宣傳機構和制度是美國冷戰宣傳史研究的題中之義，歷來為該領域學者所重視。不過，在該領域發展的早期階段，學界主要關注的是「頂層」宣傳機構，包括美新處、CIA，以及設立在NSC之下的心理戰和對外宣傳協調機構^⑩。《宣傳研究》在第二章中，則根據自身議題，將宣傳機構的研究推進到駐外機構層面，不僅考察它們與頂層宣傳機構之間的組織關係，而且在組織文化的視野下考察香港美新處這

一主要機構的運作模式，同時研究其與作為輔助站點的台北美新處和東南亞美新處之間的運作與合作。通過這種組織社會學考察，翟韜洞察到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在組織結構上具有「遙控指揮」、「頭重腳輕」的特點(頁102)，即華人華僑宣傳不是由東南亞當地美新處主導，而是由港台美新處主導。

對於這種組織結構格局的形成，翟韜指出這是由美國對華人華僑宣傳的基本定位所決定的：這一時期美國把對華人華僑的政策納入對華冷戰對抗戰略考量，而非出於其東南亞政策考量。而到196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已形成明確而自覺的第三世界政策，相應地，第三世界國家、東南亞國家作為明確的地理和地緣政治單位浮現在美國的戰略視野中，對這一地區的華人華僑宣傳政策隨之邊緣化。這種基於美國宏觀戰略演變的解釋思路，無疑是正確的，也是深刻的，但筆者認為需要相關第一手官方檔案的支撐，而這是本書有所欠缺的。

根據NSC下設OCB在1957年底的一份報告，當時在東南亞地區生活的華人超過1,000萬，佔東南亞總人口的6% (其中泰國約300萬，菲律賓約340萬，印尼250萬，馬來亞220萬)，是當地最大的少數族群^⑪。從理論上說，他們都是美國宣傳的目標和對象。但翟韜指出，美國宣傳機構瞄準的實際上是受過教育、有知識的「精英階層」，尤其是青年學生、知識份子、教育工作者和媒體人，而這些目標人群的鎖定決定了刊物、書籍為主的文字出版物成為重點宣傳媒介。其中，刊

物以《今日世界》為代表，書籍則以香港美新處「書籍項目」資助翻譯、創作和發行的「反共」主題著作為代表（頁135）。為了清晰呈現美國宣傳的規模和聲勢，翟韜以表格的形式詳細列出了1950年末至1961年「書籍項目」蔚為大觀的「成果」。據此可知，十年間，美國宣傳機構出版的圖書不少於301種、867萬冊（頁162-67）。

其實，美國的印刷宣傳品不止於書刊，還包括了日常用品。比如，1956年，美新處不無創意地設計了一款中文日曆，在大量華人聚居的東南亞國家分發。負責此項工作的官員講，該款日曆每頁都刊登了「中國歷史事件或神話中的某個故事，強調共產黨人會加以摧毀的傳統和美德，如孝道、熱愛宗教、尊重個人、熱愛自由等」。據說，該日曆備受歡迎，一經發行便銷售一空，最終印刷居然超過12.5萬冊^①。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翟韜為何用「浩大」（頁1）一詞來形容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運動；而如何從這些浩大、複雜的政策行動中凝煉出足可聚焦的主題，便成為決定研究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

三 文本分析和思想 「偵探」

對於宣傳史研究所包含各項內容的不同學理地位，翟韜有着清醒的認識。他不滿足於把宣傳史「降格」為傳統外交史，認為於宣傳史研究而言，政策研究只是起點而非終點；有意義的宣傳史研究，需要

與文化史結合起來，對宣傳文本進行話語分析，以探求宣傳話語和形象的建構，揭示文本背後的深層意識形態、身份認同和文化心理（頁14）。基於這種認識，《宣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動與美國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轉向」對接，就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材料進行文本解讀，以揭示其主題和形象。這構成本書最為重要、也是最具創新性的部分。

《宣傳研究》第三章在對美國宣傳材料進行文本解讀時，主要運用了話語分析的方法。話語指使用中的語言，特別指用於特定目的、在特定領域使用的語言（包括宣傳語言），各種話語複雜的相互作用構成了文化內容，反映着思想脈絡。外交史研究的話語分析就是要揭示思想領域和外交行動領域間看似毫不相干，實則存在「正相關聯繫」^②。從美國外交史學家已有的成功實踐看，話語分析主要有兩條路徑：第一條路徑關注公共話語與外交政策間的關係；第二條路徑是對外交決策者的各種文本進行「審問」（interrogate），在把這些文本作為文字作品對待的同時，更把它們看作廣闊的社會、文化意義系統的產物，由此考察決策者如何賦予世界以意義，並對之傾注感情，運用「修辭建構物」（rhetorical constructs）去貫徹具體的行動路線^③。簡言之，文本分析如同思想「偵探」，一方面具有解構文本話語策略的功能，另一方面具有揭示話語和文本背後「製造者」的隱秘意圖、身份認同、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真相的作用。本書對上述兩條路

有意義的宣傳史研究，需要與文化史結合起來，對宣傳文本進行話語分析。基於這種認識，《宣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動與美國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轉向」對接，就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材料進行文本解讀，以揭示其主題和形象。

美國關於「華夷之辨」的宣傳論調和圍繞這個概念建構的反共意識形態，與經典意義上美國的冷戰意識形態存在顯著的差異：後者是兩種「現代性」版本之爭，而前者卻在現代性的意識形態之爭中加入傳統的成份，加入身份認同和民族文化的因素。

徑均有着嫺熟的運用，很好地發揮了文本分析的思想「偵探」作用，精彩地解構了美國「宣傳家」給東南亞華人華僑編織的「意義之網」。

翟韜認為，美國在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中，為了達到「擁台」、「反共」、「揚美」三大目標，分別塑造建構了三個形象和話題：「華夷之辨」、「大陸「流亡者」的反共小說」、「華人的美國夢」。

首先，所謂「華夷之辨」就是把中華民國（台灣當局）與新中國塑造成截然對立的形象：前者作為「自由中國」，是東亞華人世界的政治正統和中心、「正宗」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和守護者；後者作為「外來政權」則是蘇聯的政治「傀儡」、中華文化的「異端」和破壞者（頁178-80）。翟韜指出，美國建構兩種對立形象的目的，是以此促成東南亞華人華僑對台灣當局的認同和效忠、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厭惡和疏離感。

而這種意圖改變東南亞華人華僑價值觀的宣傳手段也具有「相反相成」的特點：建構政治「華夷之辨」形象時，濫用歷史來建構現實；建構文化「華夷之辨」時，則主要採取「去歷史化」、「去背景化」的策略；同時，二者又有相通之處，即都用簡單的漢民族主義解釋複雜的歷史現象（頁187）。通過這樣的辨析，翟韜看到了美國關於「華夷之辨」的宣傳論調和圍繞這個概念建構的反共意識形態，與經典意義上美國的冷戰意識形態存在顯著的差異：後者宣揚的「自由世界」與共產主義「極權社會」之爭，主要關涉兩

種生活方式和人心之爭，是兩種「現代性」版本之爭；而美國的對華冷戰宣傳卻在現代性的意識形態之爭中加入傳統的成份，加入身份認同和民族文化的因素，強調愈代表傳統者愈具有正當性、愈值得認同和效忠（頁225）。

他進一步指出，這種思維方式和宣傳思路反映出美國決策者對於共產主義的一種深層次文化心理：共產主義是人類發展模式中的「異類」，不僅不是人類未來發展的模式，甚至和傳統文明也不相容，只有對「生病」的文明體才有吸引力；復興第三世界國家的傳統文化、重建「健康」的文明體，本身就是對於共產主義絕好的「免疫力」（頁226-27）。這是一種深刻的思想剖析，堪稱「誅心之論」。

其次，《宣傳研究》對大陸赴港「流亡者」反共小說的考察也引人入勝，不僅介紹了大量「禁書」，包括蜚聲世界文壇的華人女作家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等，帶給人們另類的文學閱讀體驗，而且對這些小說進行「解碼」，「破譯」了其背後美國人深層次的文化心理。翟韜發現，這些反共小說主要有兩類題材：一是「青年對革命的幻滅」的「醒悟體」，二是「逃離鐵幕、奔向自由」的「流亡體」（頁248）；包含着香港美新處着力宣傳的三個主題：借流亡者之口宣傳大陸黑暗殘酷的現實、對流亡行為賦予「在冷戰雙方中做出選擇」的象徵意義、共產主義與「自由世界」（即「鐵幕」內外）二元對立的意象；炮製了三套二元對立的話語體系：政治和宗

教層面上的天堂與地獄、和平與暴力、光明與黑暗等，倫理層面上的人性與魔鬼，「社會病理」意義上的正常狀態與精神病（頁262）。

翟韜指出，「反革命—精神病」話語實際上是1950、60年代流行於美國政學兩界的「現代化」理論在美國對外宣傳活動中的反映（頁254-55），而把流亡行為建構為一種類似宗教朝聖般的舉動，則是美國人對於自身起源神話和自我身份想像的投射（頁261）。總之，「流亡者」反共小說把文學傳記書寫和意識形態滲透結合在一起，實現了「反共意識形態的擬人化」，完成了迎合美國宣傳官員意圖的「編碼」（頁269-70）。而對於翟韜而言，其工作則是「解碼」了反共小說所包含的美國人的文化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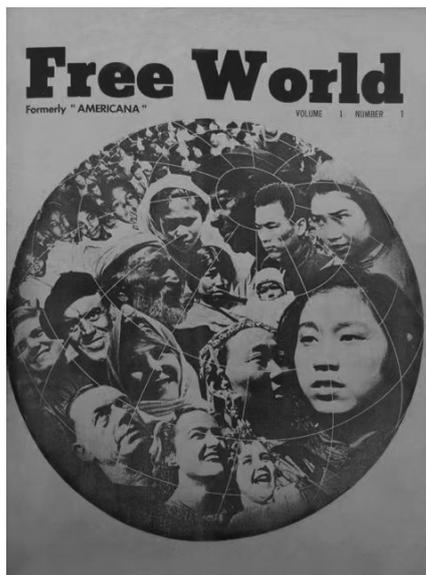
再次，「華人的美國夢」是1950年代中期之後，美國對華人華僑宣傳重點打造的一個形象和主題。圍繞這一主題，美國宣傳部門廣泛宣揚華裔美國人白手起家，經個人奮

鬥，受到社會和政府幫助，並未遭受種族歧視，最終實現經濟社會地位上升的「先進事迹」，反映了美國對外宣傳從推廣自由民主價值觀轉向推銷美國生活方式與消費主義的趨勢。在這一波宣傳中，美國宣傳媒體塑造了在美華人的三個「勵志」形象：白手起家、社會流動和種族和諧（頁271）。翟韜指出，這些形象建構體現了美國對第三世界的「冷戰東方主義」戰略，即美國外交政策制訂者和知識份子、大眾文化傳播者「共謀」，建構美國引領和指導東方的亞洲文明、兩者相融合的意象和輿論氛圍，實現從文化上控制第三世界的目的（頁308）。此外，「華人的美國夢」體現了50年代中期之後美國人對於自身形象的新認知，投射了美國人新的身份意識，包括物質豐裕、消費主義、大眾社會、中產階級、個人自由、技術進步、機會平等、多元文化，等等（頁312）。

總之，對宣傳主題和形象的分析表明，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不僅具有美國冷戰宣傳的一般特徵，即擴張政治力量或表達其文化和社會身份的工具、兩大對立陣營意識形態的競爭、兩種現代性的較量；而且具有特殊性，即塑造華人身份認同、改造其價值觀的高層次的文化戰略；同時也是文化體之間的碰撞、試圖進行文化改變的文化人類學現象（頁334-35）。翟韜解釋說：

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宣傳部門的目的是要把冷戰政治信仰和意識形態因素建構為華人政治認同和民族身

在美華人的形象建構體現了美國對第三世界的「冷戰東方主義」戰略，即美國外交政策制訂者和知識份子、大眾文化傳播者「共謀」，建構美國引領和指導東方的亞洲文明、兩者相融合的意象和輿論氛圍，實現從文化上控制第三世界的目的。



《自由世界》(Free World)是冷戰時期美國對東南亞地區進行宣傳的旗艦刊物。(資料圖片)

份認同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反過來說，把華人民族身份意識的話題整合進冷戰意識形態當中。換句話說，美國宣傳部門在冷戰意識形態當中加入了身份認同和民族文化的因素，把冷戰意識形態這種政治理念之爭同時也建構為一種基於文化的身份與特性的差異。(頁340-41)

這是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冠之以標題「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的根據所在。這一畫龍點睛式概括也點明了本書的開創性意義。

四 存在的問題和有待拓展之處

從學理上講，效果評估是宣傳研究完整程序中的最後一環，不可偏廢——《宣傳研究》最後一章在此方面做出了努力。不過，總體上看，該部分是全書研究最為薄弱的地方。這裏存在着一個作者難以逾越的資料障礙——不僅受眾面的資料七零八落，極度分散，而且受眾本身的族群、語言、信仰千姿百態，極富多元性。故此，翟韜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以美國宣傳部門的宣傳計劃、執行報告以及相關文件中對宣傳效果的自我評價為主要材料來源，進行輔助性、初步性評估。

翟韜指出，美國宣傳部門清醒地意識到宣傳工作的限度，對美國有利的輿論和態度的形成，以及美國心理戰宣傳目標的實現，絕非僅依靠宣傳和心理戰部門的工作就能

單獨達成，尤其是「反共」和「擁台」這兩個目標的實現，與中國大陸、美國和台灣當局實際的政治作為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很多重大的國際、國內政治事件和外交行動發生之後，就會形成特定的輿論影響：對美國有利的輿論，宣傳部門的作用僅限於可以推波助瀾；對美國不利的輿論，無論宣傳部門如何努力也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宣傳和心理戰活動在解釋政策、政治和外交行動方面發揮作用的空間非常有限。對於宣傳部門的這種「自謙」，翟韜沒有進一步的評論，想必他也認同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效果欠佳的判斷。

這種效果評估可能是正確的，美國歷史學者布雷津斯基(Gregg A. Brazinsky)關於1950至1979年間中美在第三世界「人心之爭」的研究提供了一個佐證。他認為「地位是這場鬥爭背後最重要的驅動力」：對中國領導人來說，提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是「結束中國屈辱歷史、重新獲得失竊的榮譽和榮耀的一種手段」；美國領導人則擔心「如果中國成功，將威脅到他們將新獨立國家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雄心」，因此採取了一系列「阻止北京獲得其渴望的地位」的行動，包括對東南亞華人的文化外交。然而，競爭雙方在實現各自目標方面均進展甚微。事實上，中美競爭只是給目標國家帶來了額外的外交困難，他並最終表明「尋求地位容易，獲得地位困難」^⑭。

如果說效果評估方面的欠缺情有可原，那麼《宣傳研究》對於美

很多重大的國際、國內政治事件和外交行動發生之後，就會形成特定的輿論影響：對美國有利的輿論，宣傳部門的作用僅限於可以推波助瀾；對美國不利的輿論，無論宣傳部門如何努力也無法從根本上扭轉。

五 結語

國冷戰宣傳的另外一個目標——促進華人華僑融入當地社會——的研究，卻淺嘗輒止，不能不說是一大缺失。因為作者在論述 1956 至 1957 年美國調整其海外華人政策時明確指出，把「促進華人華僑融入當地社會」加入宣傳目標當中是政策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頁 76）。因此，讀者自然會產生這樣的閱讀期待，希望看到作者在如下問題上作出精彩闡釋：為了實現「融入」的目標，美國宣傳機器是否也像對待「反共」、「擁台」和「揚美」目標一樣，塑造了相應的話題和形象？又反映了何種美國人的文化心理？以及實現的效果如何？然而，本書並未就這些問題展開深入討論。隨之而來的疑惑是，對「融入」目標存而不論，是歷史實情，還是作者「疏漏」？若是前者，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何在？美國相關政策制訂者和實施者是如何認識這種情況的？若是後者，有哪些因素限制了作者的研究操作？等等。諸如此類問題都是有待拓展和解答的。

其實，就「融入」問題而言，的確存在許多值得開掘的研究點。比如，從《宣傳研究》本身提供的信息可知，在特定歷史時期，新中國政府、美國政府都執行過鼓勵東南亞華人華僑融入當地社會的政策。這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如何認識這種政策「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對中美關係、中美各自對東南亞國家關係、新中國與港台的關係來說意味着甚麼？「一致性」表面下的「不可通約性」是甚麼？這些也是讓筆者浮想聯翩的問題。

白璧微瑕，儘管有一些問題和缺失，但作為一部學術領域結合的交叉型著作，《宣傳研究》仍不失其廣泛的、創新性的啟發意義：對中美關係史而言，對美國華人華僑宣傳政策的研究，揭示了美國敵視新中國政策的廣度和深度；對美國對外宣傳史而言，文化研究方法的借用、宣傳文本的深入解讀、主題和形象的精確提煉，尤其是其與美國的意識形態、文化心理與身份構建的聯繫的揭示，拓展了相關研究的視野和方法；對華人華僑史和東南亞史而言，美國對華冷戰文化外交分析視角的介入，則預示了從大國競爭視角拓展和深化相關研究的可行路徑。

至於《宣傳研究》存在的前述不足，其實很難在一部從文化史角度探討美國對特定人群的宣傳活動的專著中得到圓滿解答，而需要適當拓展國際史視角，把各方對東南亞國家的文化外交考慮進來，考察新中國、美國、台灣當局、東南亞之間的複雜互動，揭示它們之間，尤其是中美之間在文化外交上的競爭。顯然，這是一項非常龐大的研究工程，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研究者經年累月的長期投入。

近年來，翟韜相繼承擔了「冷戰前期美國對華宣傳與文化外交研究（1949-1972）」、「文化冷戰視野下的美國與香港、台灣關係研究（1949-1979）」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正在闊步邁入這一具有廣闊前景的研究領域。我們期待他相

從《宣傳研究》提供的信息可知，在特定歷史時期，新中國政府、美國政府都執行過鼓勵東南亞華人華僑融入當地社會的政策。如何認識這種政策「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對中美關係、中美各自對東南亞國家關係、新中國與港台的關係來說意味着甚麼？

關精品力作的盡早問世，為《宣傳研究》所遺留的問題提供進一步的解答。

註釋

① 〈第二屆楊生茂美國史最佳青年論著獎頒獎詞〉(2022年9月15日)，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網，www.ahrac.com/view_12_3030_0.html。該獎項是國內資深美國史學者(主要是楊生茂先生的弟子)為了紀念中國的美國史學界主要奠基人之一、南開大學已故著名學者楊生茂，於2017年設立，用於獎勵國內青年學者所發表的美國史研究成果。該獎項每四年評出一部最佳著作、一篇最佳論文，具有極高的專業性和權威性，甚為學界推崇。

② Harry S. Truman,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Greece and Turkey: The Truman Doctrine" (12 March 1947), 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32818.

③ 齊世榮主編：《當代世界史資料選輯》，第一分冊(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0)，頁89。

④ George Bush, "Remarks and a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with Reporters in Paris, France" (21 November 1990), 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64992; introduction to Thomas C. Reed, *At the Abyss: An Insider's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4), 1.

⑤ 翟強：〈國際學術界的冷戰時期美國宣傳戰的研究〉，《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頁155-69。

⑥ 翟韜：〈現代化理論與冷戰政治——冷戰史研究中一種新的學術潮流〉，載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編：《北大史學》，第十五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379-400。

⑦ 翟韜：〈「文化轉向」與美國冷戰宣傳史研究的興起和嬗變〉，

《世界歷史》，2018年第3期，頁125-43。

⑧ 翟韜：〈超越冷戰史：美國冷戰宣傳研究的新趨勢〉，《歷史研究》，2018年第5期，頁167-77。

⑨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Hugh Wilford, *The Mighty Wurlitzer: How the CIA Played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Sawn J. Parry-Giles, *The Rhetorical Presidency,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5* (Westport, CT: Praeger, 2002);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⑩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Guidelines for United States Programs Affec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11 December 1957),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www.gale.com/c/us-declassified-documents-online, CK2349159358.

⑪⑫ Gregg A. Brazinsky,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7), 163; 1, 6, 8.

⑬ Emily S. Rosenberg, "'Foreign Affairs' after World War II: Connecting Sexu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iplomatic History* 18, no. 1 (1994): 59-70.

⑭ 曲升：《美國外交史學轉型研究(1970-201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頁266-68。

曲 升 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